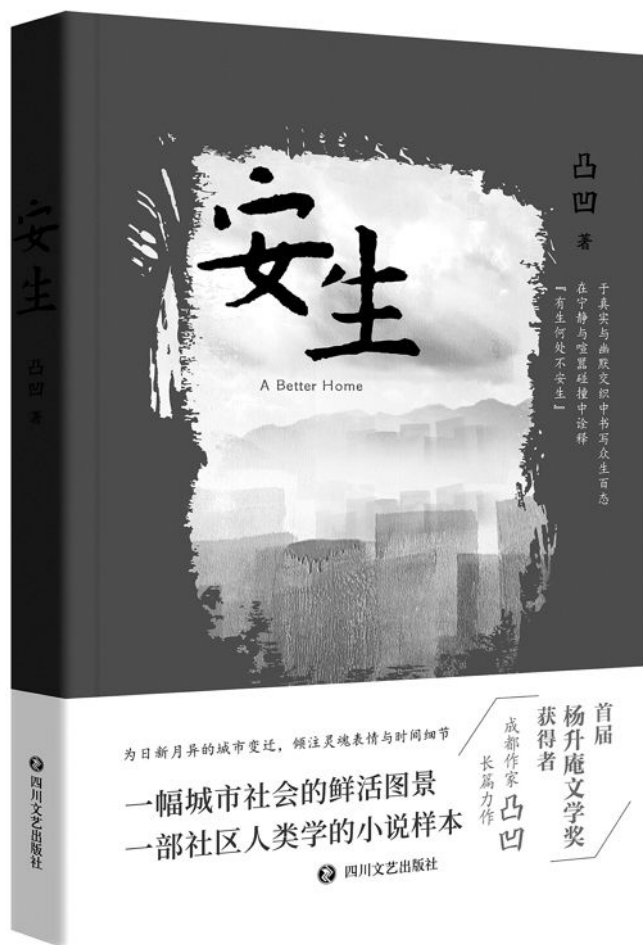


# 人如何诗意地栖居？

评凸凹长篇小说《安生》

□刘小波



为日新月异的城市变迁，倾注灵魂表情与时间细节  
一幅城市社会的鲜活图景  
一部社区人类学的小说样本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首届  
杨升庵文学奖  
获得者  
成都作家凸凹  
长篇小说

而增加了不少，甚至连卖掉别墅的心思也有了。首先是“鼠患”问题，最为吊诡也颇为讽刺的是，新置换的别墅依然有“鼠患”，讽刺效果不言而喻。接着是“搭建”引发的种种矛盾，还有装修时家人摔伤，沉迷风水的问题，等等。到了《花园分叉的小径》这一部分，住进别墅之后的萧不系将倾诉自己住别墅的烦恼作为人生最高追求，结果却带来更大的烦恼，作家笔下的意味颇值得玩味。当然，这种烦恼有一定的炫耀成分，还是滑向那种世俗的虚荣心理。

由此，作品其实更多的还是在“安居”的主题之上，寻找精神的皈依之所、灵魂的栖息之地。说到底，小说是继续讨论“人如何诗意地栖居”这一古老的话题。《安生》主要是中产阶层这一群体的书写，写人到中年如何安放肉体与灵魂这一主题，这是当下很多作品都写到的主题。表面上看起来作品聚焦的是社区治理这样的现实民生问题，是安居的问题，其背后也是灵魂如何安放的问题。虽然小说中的主人公一直有一个住进别墅的梦想，很明显，置换别墅并不是一个必然行为，而是一时兴起，只是在中年遭遇种种生活烦恼之后，寻求的一个突破口，本来是企图安放不安的灵魂，结果适得其反。“鼠患”是小说反复提及的一个事件，但是种种迹象表明，“鼠患”明显存在于心头上，其实也就是自己的“心患”。实际上在小说中，女婿没有见到被扔到路上的老鼠，新的房子似乎也没有发现同样的问题，而讽刺的是，萧不系住进新别墅后依然有

老鼠。这里的“鼠患”问题实则是一个隐喻，是个体内心世界种种欲望与烦恼，是内心深处无法示人的隐秘一面。

《安生》从肉体的居所写到灵魂的栖息之地，是对当下普遍存在的一种生存焦虑的回应。封底所引“烟雨濛濛鸡犬声，有生何处不安生”诗句其实是对此问题最好的回答。作家在一种极富现实关怀的现实生活深描中，切入隐秘的内心世界，实现一种超越性书写，为个体诗意地栖居寻找着答案，最终让所有的“不得安生”，转化为“得以安生”。不过让人担忧的是，主人公萧不系后来去了大草原，在这里心灵得以净化，整个人突然醒悟，一切的烦恼似乎都烟消云散了，这是真正找到了灵魂的出路，还是又陷入另一种形式的虚荣呢？因为这种逃离生活樊笼的方法其实已经早已不再新鲜。在情节的完整性方面，每一个部分似乎都没有传统意义上清晰的结局，这种未完成性步入一种“有始无终之境”，这正是生活最为残酷也最为真实的一面，也是人类永远在寻找灵魂栖息之地的漫漫征程的一种呈现。

长篇小说《安生》，凸凹著，四川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。

凸凹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甑子场》《大三线》《汤汤水水》等20余种，编剧有30集电视连续剧《滚滚血脉》(2009年播映)。

刘小波，有多篇作品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、《长篇小说选刊》《中国文学年鉴》等转载，曾获马识途文学奖、“啄木鸟杯”年度推优等奖励。

## 叙事策略与人物命运的共振

万玛才旦《松木的清香》简评

□安殿荣

《松木的清香》曾刊于《十月》。这是作家、导演万玛才旦在世时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。得知他离世的噩耗，身边的朋友都非常意外，无不为之扼腕！我曾与万玛才旦老师在一些活动中有过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，他为人谦逊，低调少言。我更多的是通过他的小说和电影，来感知他的内心世界和艺术追求，以及他对生命的感悟、对世界的认知。

许多杰出的导演都自己写剧本，例如谷克多、爱森斯坦、伯格曼和赫尔措格。万玛才旦也有多部电影改编自他的小说。从他小说的结构和质地可以看出，他在创作小说时，就带有强烈的电影意识。《松木的清香》就是这样一个短篇，阅读时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文字背后有一个善于调度的镜头，从环境特写到人物刻画，都给予了颗粒度饱满的呈现，使读者具有很强的在场感，并采用交替、补充讲述的手法，使这个篇幅短小的作品，展现了主人公多杰太颇为曲折和令人惋惜的一生。

短篇小说因篇幅有限，对写作技巧和戏剧冲突的设置往往有更高的要求。《松木的清香》至少设置了三层戏剧冲突。

第一层冲突设置在小说开篇，来自多杰太命运的两个主要讲述者——“我”（户籍民警）和青年牧民。小说开篇为“我”和青年牧民的相遇，营造了一个极为紧张的、具有强烈冲突感的空间氛围。他们在楼道里相遇，青年牧民蹲在办公室门口抽烟，看到“我”咄咄逼人地发起责问：“这个办公室里上班的人是不是你？”“你为什么迟到了二十三分钟？”“你们国家干部上班可以随便迟到吗？”步步紧逼的三连问，强化了青年牧民与户籍警之间的对立情绪。“我”没有正面回答，打开门后，用一句“你先把烟掐掉再进来”，用制度和规则约束青年牧民，打破“我”迟到的尴尬，结束了两人对峙的第一回合。

空间是交往的媒介，当叙事空间转到“我”的办公室，这方空间随即被味道、光影、温度、声音等赋能，马上生动起来。先是青年牧民“带进来一股浓烈的烟草味和身上的汗臭味混杂在一起的奇怪的味道”，“我只好走过去打开了窗户。窗外面的阳光白晃晃一片，冬天凌厉的寒风‘呼呼’地扑了进来”，还有青年牧民电子表发出的奇怪声音的报时“北京时间，下午十五点整”。这些味道、色彩、声音，对于主角多杰太的故事来说，都是闲笔，但正是这些闲笔，在小说甫一开篇，便将读者拉进一个鲜活的场景之中，呈现了不同类型人物聚合在同一空间后产生的奇妙反应，开启了不同命运线条的碰撞与纠缠，也奠定了小说的讲述基调。当“我”发现青年牧民要为之开死亡证明的那个人自己也认识后，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，相互补充，回顾多杰太命运多舛的一生。

第二层冲突弥漫在小说全篇，主要源自多杰太与“我”的命运差距，也是多杰太在自己命运认知上的冲突。从牧区转学过来，连自己的汉文名字都不会写的多杰太，经过一年的努力，竟然

成了班里的第一名，他知道自己聪明的。但是已经失去父母的多杰太，很快又失去了庇护他的舅舅，使他没有机会再读书，成了一个小混混，后来还沾染了赌博的恶习，感受过一夜暴富的人生得意、风光无两，也尝过借贷无门、走投无路的苦果，最后在绝望中选择了死亡。多杰太成年后曾找过“我”一次，最感叹的就是：“我也觉得我这个人脑袋瓜还挺聪明的，就是这命不太好嘛。”就是这层潜在的不甘心，形成了多杰太命运的基调。这层冲突的展现，得益于作家对讲述者的成功调度，通过“我”、青年牧民、中年牧民，以及最后一个与多杰太对话的人对多杰太的回忆，使读者在简短的篇幅之内，对多杰太一生中几个关键的人生节点有了充分了解，并随他命运的转折起伏而感叹不已。

小说结尾部分，新的冲突——传统规矩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凸显出来。中年牧民按照“黑头藏人”的传统规矩处理多杰太的尸体，还请活佛算过，当晚八点实施火葬。但因为死因不明，交警提出必须进行尸检。这层冲突的设置，重点不在渲染两者的对立，而是借此戏剧性，突出藏族民众平等观念，以及对生命的虔敬之心。这也使读者突然明白了小说开头青年牧民与户籍警的冲突，他急于开出死亡证明，也是为了不耽搁火葬时间。

这三重冲突依次铺开，推给读者的是关于命运的思考以及对生命的态度。同样聪明的两个人，甚至是更聪明的多杰太，始终没有过上“我”这样的体面生活。也许是基于这个原因，“我”主动为多杰太的火葬选择了更好的松木。这里面也不乏一种惋惜和补偿的态度吧。小说结尾还特别写到对多杰太骨灰的处理。“一些细碎的粉末状的骨灰沾在了我们的手上，我们的脸上，我们的头发里，我们的衣服上。”“一些骨灰肯定也被我们吸进了肺子里。”这是一层很深刻的隐喻。四处飞扬的骨灰沾染到“我们”的身上，渗透到“我们”的身体里，引起了“我们”短促有力、富有节奏感的咳嗽，更强调了一种命运的相关性，体现了生命之间的相互纠缠、交叉与渗透。因而，他者命运的复杂性，也不仅仅存在于单独的个体，这也是小说讲述个体命运的意义所在。

万玛才旦通过这三层冲突的设置，使人物命运波澜立现，也使小说主题表达更为丰富深刻，余味悠长。美国评论家赫曼·G.温伯格曾说，叙述故事的方式本身就是个故事。同样一个故事，能讲好也能讲糟；有人能把一个故事说得娓娓动听，更有人能把它讲得十分精彩。这取决于讲故事的人是谁。万玛才旦无可争议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。然而天妒英才。斯人已逝，相信万玛才旦的文字和镜头留给我们的思考将是深刻的、恒久的。

安殿荣，中国小说学会理事、会理事，有作品散见于《南方文坛》《满族文学》《广西文学》《文艺报》等报刊。